

義大利共產黨的新探索（一九八〇—一九八六）

——國際共運與民主輪替

熊自健

一、發展國際共運的自主性

義大利共產黨的「歷史性妥協路線」從一九七七年起遭受挫敗。義共在一九七七年局部地方選舉中獲得二八·八%的選票，減少九·五%；在一九七八年另一地方選舉中獲得二六·五%的選票，減少九·一%；在一九七九年大選中獲得三〇·四%的選票，減少四%。同時義共黨員銳減，一九七八年失掉黨員二萬五千名，一九七九年又損失兩萬九千名，八〇年再失去七萬名黨員。實踐已經檢驗出「歷史性妥協路線」即將落幕，義共又走到探索新路線的關口上了。

義共的新探索這回是從發展國際共運的自主性來突破困局。一九八〇年四月義共總書記貝林格訪問中共，恢復兩黨中斷十餘年的關係。貝林格臨行前在機場舉行的記者招待會上說：「我們是本著友好的精神和抱著更好地瞭解與熟悉社會主義中國的現實和中共的政策願望去中國大陸。我們將非常坦率地討論兩黨共同感興趣的問題：雙邊關係，發展中共同義大利的合作，同時也將討論諸如世界和平和國際合作等重大問題」^①。其實恢復兩黨關係才是真正的目的。貝林格到大陸時，中共總書記胡耀邦與主席華國鋒在與義共總書記貝林格的會談中宣稱：中共與義共在完全平等、獨立自主、相互尊重的基礎上恢復關係。貝林格也強調兩黨致力於相互瞭解、尊重彼此的獨立和各自的獨特性、坦率地闡明分歧問題以及致力於尋求一切可能的共同點和合作^②。鄧小平在會見義大利記者時坦白地表示：在當前嚴峻的國際形勢下，中共面臨的重要任務是爭取世界和平、安全和穩定。在這個意義上來說，兩黨在現在這個時刻恢復良好的同志關係，具有重要意義。中共與義共有相當多的共同點，也有不同的意見，但這不要

註① 義共總書記貝林格訪華前夕發表談話，〈人民日報〉，一九八〇年四月十五日第六版。

註② 在歡迎義共中央代表團宴會上華國鋒與貝林格的祝酒詞，〈人民日報〉，一九八〇年四月十六日第四版。

緊，重要的是尋求更多的共同點。今天我們把分歧擺在一邊^③。由此觀之，義共與中共不僅恢復了兩黨的關係，同時也發展出國際共運的新型態。鄧小平把這種新型態的國際共運歸結為「處理兄弟黨關係的一條重要原則」：「各國黨的國內方針、路線是對還是錯，應該由本國黨和本國人民去判斷。我們反對人家對我們發號施令，我們也決不能對人家發號施令」^④。對義共而言，這種新型態的國際共運在六十年代中期就由陶里亞蒂所提出，並且在七十年代為「歐共主義」所實踐，如今不過是擴大陣營，落實為中義共間的新里程。爾後中共與義共本著這種獨立自主、相互尊重、求同存異的原則，共同努力發展彼此間的關係；並且激起其他歐共主義共黨競相追隨，紛紛與中共恢復關係，發展友誼。

然而義共更為驚人的突破却是在它與蘇共之間的爭執與論戰。一九八一年二月義共宣佈出席蘇共二十六大的代表團由義共國際關係負責人巴葉塔（Pajetta）率領。這是貝林格擔任義共總書記以來第一次不出席蘇共代表大會，義共同蘇共在阿富汗和波蘭問題上存在嚴重分歧是貝林格不去莫斯科的主要原因。巴葉塔赴莫斯科後再度闡述了義共對阿富汗和波蘭問題的立場：義共認為必須通過有關方面的談判來尋求政治解決，以便排除任何干涉和任何外國軍隊的存在，來保障阿富汗的獨立、不結盟和阿富汗人民自己決定自己命運的權利。義共同時也在擔憂的心情下懷著希望和信任密切注視著波蘭事件。義共認為一種得到人民的贊同和參加、而且完全尊重波蘭人民獨立自主的政治解決，能夠和應該保障波蘭的社會主義和民族獨立。^⑤但是蘇共二十六大却不讓巴葉塔上臺發言，引起義共強烈反響：義共的領導人物說永遠不會忘記蘇聯的粗暴態度，貝林格指出蘇共的做法是荒唐的舉動，巴葉塔亦表示義共不低估代表團在蘇受冷遇的政治意義^⑥。蘇共二十六大風波點燃了義共與蘇共論戰的火把。

一九八一年底，波蘭軍事當局實行軍管，加深波蘭危機。貝林格指出蘇聯應對波蘭情勢惡化負最大的責任。隨後貝林格在義共黨內舉行對波蘭問題的辯論，企圖肅清黨內哥殊塔（A. Cossutta）的親蘇言論。十二月卅日義共發表〈關於波蘭戲劇性事件之反應〉的議決書，表明義共對波蘭事件的看法。該文特別指責蘇聯對波蘭事件產生負面的作用，同時蘇聯式的共產主義壓制人權與自由，在經濟上又缺乏效率，因此它不適合於歐洲^⑦。一九八二年一月六日哥殊塔撰文表示不同意義共對波蘭問題的觀點，引起義共內部騷動。一月中旬，義共中央委員會召開全體會議，以壓倒性多數通過貝林格對蘇聯體制的批評意見^⑧。義共決議認

註③ 鄧小平會見義大利記者，〈人民日報〉一九八〇年四月十八日第一版。

註④ 鄧小平，〈處理兄弟黨關係的一條重要原則〉，收編在〈三中全會以來重要文獻選編〉，北平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二年，頁四九三—四。

註⑤ 巴葉塔說義共和蘇共在重大問題上存在分歧，〈人民日報〉，一九八一年三月一日第六版。

註⑥ 蘇共二十六大不讓義共代表發言引起強烈反響，〈人民日報〉，一九八一年三月二日第六版；蘇共不讓義共發言是荒唐的舉動，〈人民日報〉，一九八一年三月四日第六版；義共領導機構聽取巴葉塔的匯報後發表公報，一九八一年三月十日第六版。

註⑦ "Takeover Is Denounced By Italian Communists" in *New York Times*, Dec. 30, 1981; Carolyn Friday. "We had Nothing to do With Poland", in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Jan. 15 1982, p. 12.

註⑧ G. Armstrong, "Berlinguer dismisses the Moscow route" in *The Guardian*, Jan. 16 1982, p. 5; "Italian Communist Party Takes New Step Away From Moscow", in *The Japan Times*, Jan. 17 1982, p. 3.

為蘇聯現在所採取的政治立場和具體行動，阻礙了國際緩和的進程和爭取和平的鬭爭；它所推行的是一種不折不扣的強權政策；東歐各國照搬蘇聯的模式給它們帶來了消極的後果和損失。義共並且認為以十月革命為起點的社會主義發展階段已經結束了它的推動力，西歐國家要尋求一條既有別於蘇聯又不同於社會民主黨的「第三條道路」^⑩。

一月二十四日蘇共黨報《真理報》發表題為《違背和平與社會主義的利益》的編輯部文章，指名攻擊義共。蘇共同時期出版的《共產黨人》亦發表論調相同的批評文字。《真理報》的文章以見解荒謬、誹謗蘇聯、醜化蘇聯的罪名攻擊義共；並說義共中央全會所通過的決議中以及義共領導人在全會中的講話，都談到了同蘇共、蘇聯、社會主義大家庭各國、絕大多數共產主義運動和整個解放運動在一切極重要的政策問題上相對抗的行動綱領。《真理報》的文章還指責義共企圖證明蘇聯和華沙公約的對外政策，整個說來與美國北約的對外政策，沒有區別，這是道道地地的褻瀆行為。義共的行動直接幫助了帝國主義、反共主義和一切敵視社會進步事業的力量^⑪。廿六日，義共《團結報》發表題為《對真理報的答覆——我們的立場來自事實》一文，駁斥蘇共的攻擊。《團結報》的文章表示：《真理報》文章的調子不是那種想擺事實講道理的人的調子，而是那種想表達從「中心」和「領導」作用派生出來的最高的政治意識形態判斷人的調子。這種中心和領導作用早已宣告結束，近幾年來也一直遭到義共的反對和摒棄。義共對蘇聯的外交政策也進行獨立的判斷，表示保衛和平是義共國際政策的根本目標，義共不能支持那些與此目標相違背的行動，如武裝干涉捷克和阿富汗。蘇聯還試圖在它周圍重建各共產黨和人民解放運動唯一世界領導中心的願望^⑫。《團結報》二月一日刊登貝林格在一次會議上的講話，他諷刺蘇聯說：「我們認為，那種把別人革出教門的時代早就過去了。然而，我們現在又聽到了那些自認為是負責保衛信條和對別人提出譴責、充當某種最高法庭角色的人的聲音」^⑬。爾後義共不停地推出駁斥蘇共的論戰文章^⑭，直到十月蘇共中央委員柴格拉丁（V. Zagladin）訪問義共，雙方緊張對立的形勢方告緩和下來。

義共與蘇共之間的論戰，再次顯示出義共獨立自主的「歐共主義」性格。同時義共在論戰過程中，一再地重申其「歐共主義」的基本立場：黨與黨之間的關係應遵守獨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的原則；堅決反對國際共運中存在領導黨或中心，反對

註⑩ *Ibid.*, p. 3. 亦見《譴責蘇共對待外國黨的態度和做法》，《光明日報》，一九八二年一月卅一日第三版。

註⑪ G. Armstrong: "Pravda's Methods not new" in *The Guardian*, Jan. 26 1982; "Italians are denounced by Pravda" in *The Time*, Jan. 25 1982, p. 4; "Kremlin Denounces Italian Communists" in *The Japan Times*, Jan. 25 1982.

註⑫ 《義共》團結報《駁斥蘇聯《真理報》的攻擊》，《人民日報》一九八二年一月卅日第六版。The Italian Communist Party, "How the crisis in Poland calls into question the Soviet model of socialism itself", *The Guardian*, Feb. 8 1982.

註⑬ 《貝林格反駁蘇聯《共產黨人》雜誌的攻擊》，《人民日報》，一九八二年一月三日第七版。

註⑭ 《義共《再生》週刊駁斥蘇《共產黨人》的攻擊》，《人民日報》，一九八二年二月十日第七版。《駁斥蘇《真理報》的再次攻擊》，《人民日報》，一九八二年二月十六日第七版。《貝林格指責蘇聯以中心黨自居歪曲義共立場》，《人民日報》，一九八二年二月廿二日第六版。

干涉別國黨的內部事務，反對任何黨把自己的意志強加於人；主張馬列主義同各國具體情況相結合，應當允許各共黨根據各國的實際情況，尋求各自社會主義目標的道路，反對把某一國的模式當作唯一的模式強加於別人；獨立的外交政策；以「第三條道路」通往義大利社會主義等等。而義共與蘇共論戰的形勢迫使貝林格進一步探索義共的新路線，貝林格在義蘇共論戰後更加用心發展「民主的輪替」(democratic alternative)為義共的新路線。

二、「民主的輪替」路線

義共在一九八〇年年底已決定放棄「歷史性妥協」路線，而代之以「民主的輪替」路線。這表示義共不再協助義大利基督教民主黨的決策，而恢復義共原來反對黨的角色，並且希望依循民主政治的程序，聯合義大利左派，奪取政權。一九八一年五月義共猛烈攻擊義大利基督教民主黨弗蘭尼(A. Forlani)的聯合政府，公佈義大利政府內政軍要人參加非法組織「共濟會」(Masonic association)的名單，迫使弗蘭尼聯合政府垮臺。同時義共宣稱新內閣的總理不宜由義大利基督教民主黨出任，這是義共在戰後首次公開表示基督教民主黨應結束它在義大利政壇上的霸權。一九八一年六月義大利地方選舉過後，義大利共和黨領袖斯帕多利尼(G. Spadolini)奉命組閣，隨即組成一個由共和黨、社會黨、基督教民主黨、社會民主黨和自由黨五黨聯合政府。至此，義共達成了迫使基督教民主黨不出任總理的初步目標，接著又批評新政府無力挽救義大利的危機^⑭。

一九八二年四月貝林格率團訪問法國。他在巴黎透過《世界報》(Le Monde)的採訪，向世人說明義共「民主的輪替」路線：義共這條新路線是要聯合義大利全部左派的力量，可能的話也將聯合其他民主黨派的力量，組成一個沒有基督教民主黨的政府。然而這並不意味義共和其他黨派聯合時，可以不依據一些共同所接受的原則(如義大利憲法)來形成某些共同的決議^⑮。

一九八三年三月義共召開第十六屆全國代表大會，貝林格提出題為「在經濟與國家面臨危險，歐洲與世界和平遭到嚴重威脅的情況下，義大利共產黨人提出的倡議與建議」的報告。在此報告中，貝林格全面發展出一條新路線來，其基本方向為：

(一)捍衛國際和平。義共認為以美國為首的一邊和以蘇聯為首的一邊的尖銳對立，是緊張局勢、擴充軍備、戰爭冒險的根源。義共贊成 Kennedy-Hatfield 的限武方案，美蘇兩超級強國應全面凍結核子武器。至於歐洲部署飛彈問題，義共要求義大利政府

註⑭ Yearbook on International Communist Affairs, (YICA) 1982,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p.308.

註⑮ "An Interview with E. Berlinguer, We must prove that Socialism can be based on democracy" in *Le Monde* (April 2, 1982); "Berlinguer: Socialism base on democracy", in *The Guardian* (April 25, 1982).

對這一問題延緩做出任何決定。然而這並不是說，義共提出這類問題實際上就是讓義大利退出北約。義共贊成義大利和美國之間的友好與合作關係，但不要卑躬屈膝地伺候美國。義共堅決反對帝國主義的侵略行徑。義共譴責並反對美國雷根政府損害和威脅中美洲人民的獨立，譴責並反對南非、以色列等統治集團的帝國主義行徑。義共認為蘇聯對阿富汗的軍事干涉，證明了蘇聯已經採取了強權政治的做法，蘇聯還可能幹出那種同緩和局勢、尊重各國人民主權與獨立背道而馳的事來。義共永遠同巴勒斯坦、黎巴嫩、納米比亞、莫三鼻給、津巴布韋的人民站在一起。

(二)發展西歐工人運動。西歐資本主義已進入所謂福利國家，政府推動各項社會福利政策，階級對立和緩並相互妥協，人民的生活水準顯著地提高。然而福利國家近年來出現危機，大量的失業、公共支出過份膨脹、經濟成長呆滯等顯示資本主義即將轉型。法國社會黨與共產黨的聯合政府已經出現一股新的潮流；西班牙、葡萄牙、希臘不但從獨裁邁向民主，而且由社會黨執政；都說明西歐工人運動的新氣象。婦女解放運動、和平運動也與工人運動互通聲氣，齊頭並進。西歐的工人運動與天主教彼此也相互對話，共同反對暴力泛濫、人性墮落、販毒賣淫、追求財勢等不良社會風氣。義共認為西歐的工人運動在促進國際和平與國際經濟合作上，將扮演更爲積極的角色。義共提倡在：(1)改革國際貨幣系統，(2)發展農業，(3)加強南北合作與貿易關係這三方面，西歐工人運動可以消解以往歐洲帝國主義的遺毒。

(三)挽救義大利危局。義大利基督教民主黨在戰後統治義大利三十餘年中換了四十三屆政府，它的統治能力與威信一再地呈現危機。義共特別檢討了一九七九年之後以基督教民主黨與社會黨爲主的聯合政府的政績，這個政府在抵抗恐怖主義活動上稍有起色，然而在政治道德、經濟危機上却日益衰敗。義大利的經濟至今仍然陷於衰退的漩渦，嚴重的通貨膨脹與大量的失業並存，財政赤字巨幅增加，國際收支入不敷出。同時義大利政府政風敗壞、貪污舞弊、官員與非法組織勾結營私等事件層出不窮。政府的威信不能維持下去，公民與民主體制之間的距離擴大，帶來民主政治的危機，義共主張以「民主的輪替」來代替基督教民主黨的政府和它的政權體系，但並不排除同基督教民主黨在保衛和平與保障國家民主體制等方面的一致性。義共將採取控制財政赤字、改善南北貿易與合作的關係、改革資本主義社會結構、創造新的生產關係、努力發展農業，以及均衡的經濟發展等措施，把義大利帶入社會主義國家。義共也計劃成立一個國家勞工服務中心，管理全國勞工的就業、退休、失業、休閒、工作環境等問題。義共還要取消警政部與南方發展基金會。義共這條「民主的輪替」路線是以義大利社會黨爲主要的對話者。

(四)進一步建設羣眾政黨。義共重申陶里亞蒂在一九四四年所提出「羣眾政黨」的建黨原則，強調義共非「職業革命家」黨，它是一個根植在民主政治與國家價值中的政黨；它在羣眾日常生活中發展，在建設新社會中成長壯大。義共的社會基礎不僅在於工人階級，也要使知識份子與科技人員都加入行列成爲主幹。今天義共建設羣眾政黨的生力軍是婦女與青年，婦女解放運動與青年改革運動都增添義共的活力。因此，針對這股新生的力量，義共必須靈活地調整組織形式與宣傳活動。此外，民主地討論問題

與製訂決策是義共一貫的作風，是義共堅守民主價值的實踐保證。在各國共產黨的關係方面，義共堅決主張各國共產黨之間不存在什麼領導黨或被領導黨的關係，也不存在什麼領導中心或裁決中心，更不存在任何的特殊關係、任何組織的或紀律的束縛。國際共運應在各國共黨獨立自主、相互尊重的基礎上發展^⑧。

貝林格所提出的新路線基本上是「歷史性妥協」路線的進一步發展，其外交、經濟、國際共運的主張與立場跟「歷史性妥協」路線相一致，而在內政問題與西歐工人運動方面提出了若干新的觀點。貝林格所提出的新路線突出義共作爲一個反對黨的角色及其政治綱領，並且賦予西歐工人運動一項歷史使命，走出福利國家進入社會主義。貝林格這條新路線在義共十六大上受到些許的批評。義共左派領袖因革拉歐（P. Ingrao）表示：貝林格的「民主的輪替」不夠實際，義共在社會黨聯合爲左派的輪替應建立於平等的競爭基礎上，必須相互對話，以解開義共與社會黨之間長期衝突的死結，義共不要再試圖統制其他進步力量。惟有此，輪替的遠景始有開展的可能^⑨。納波利塔諾（G. Napolitano）從右派的立場批評貝林格的新路線，他認爲：義共的「民主的輪替」路線要求結盟合作的對象太過於偏狹，應擴大至全部中產階級，包括大企業家以及其他中左派政黨，方足以保證「民主的輪替」^⑩。

經過五天的討論，義共十六大通過了貝林格的報告和黨章修正草案，並選出了新的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貝林格再次當選爲義共總書記，納塔（A. Natta）當選爲中央監察委員會主席。貝林格在義共十六大的總結發言，還以很大的篇幅談到義共和社會黨的關係問題。貝林格不認爲即可組成一個以義共和社會黨的合作爲基礎並得到其他民主力量支持與贊同的政府，而是希望社會黨同義共一樣把「民主的輪替」作爲一種「前途」來爭取^⑪。顯而易見，義共這條「民主的輪替」路線是佈滿荊棘，艱難重重的。

三、義共新路線的難題與困境

註⑧ "L'Unita Carries Berlinguer PCI Congress Speech" in *Daily Report: Western Europe*, No. 61, (Mar. 29, 1983) pp. L1-35.

註⑨ "Communist Deputies' Speeches" in *Daily Report: Western Europe*, No. 45, (Mar. 7, 1983) pp. L2-3; "Further on Speeches, Reaction", in *Daily Report: Western Europe*, No. 45, (Mar. 7, 1983) p. L3.

註⑩ "PCI Secretariat Member G. Napolitano's 4 March Speech to PCI Congress in Milan", in *Daily Report: Western Europe*, No. 53, (Mar. 17, 1983), pp. L4-6.

註⑪ "Berlinguer Reconfirmed as Leader by PCI Congress" in *Daily Report: Western Europe*, No. 45, (Mar. 69, 1983) pp. L1-2.

一九八三年六月義大利大選，基督教民主黨慘遭挫敗，只獲得三二·九%的選票，損失五·四%；義共也失利，獲得二九·九%的選票，下降〇·五%。義共與基督教民主黨的雙雙落敗，一方面說明基督教民主黨的優勢受到空前的挑戰，另一方面突出義大利第三大黨的社會黨居於左右逢源的有利地位。選舉結束後，義共要求與社會黨合作，進行「民主的輪替」，社會黨不但加以拒絕，反而同基督教民主黨簽訂政府合作公約，由社會黨總書記克拉克西(B. Craxi)組成義大利第四十四屆內閣^②。義共的新路線再度碰壁，難以推展。

一九八四年二月義共總書記貝林格在中央委員會聯席會議上表示：義共要採取強硬的立場對抗克拉克西的聯合政府。義共要抓住一切機會，領導散佈於全國的「普遍抗議」，主動創造「民主的輪替」條件，替換克拉克西政府^③。貝林格從三方面著手向克拉克西施展壓力。他利用義共的宣傳網，不斷地抨擊克拉克西政府對遏止通貨膨脹與更新產業結構上無能為力，只會在勞動價格上想辦法；同時，他鼓勵國會議員杯葛政府的政策議案，促成內閣分裂；另外他又唆使工會發動工人示威遊行，造成克拉克西施政上的困擾^④。義共「民主的輪替」路線，更有彈性地對付社會黨，玩弄又拉又打的兩面手法。

一九八四年六月貝林格病逝，義共中央委員會與中央監察委員會召開聯席會議，通過納塔(A. Natta)繼任義共總書記^⑤。納塔在義共聯席會議上發表就職演說，申明義共今後的政策和方向：

(一) 在黨的建設方面。大家過去都同貝林格一道努力工作，結合了大家的智慧、能力與精力，來面對最困難的考驗，保證黨政治路線的明晰一貫，並且使黨發揮出它的國家與民主的功能，表現它在歐洲與國際上的角色。此外，大家也與貝林格共同更新方針，進一步地向社會開放與發展黨內民主。誠如貝林格在十六大結束時所說的：從辯論中產生的更強有力的團結，乃是結合各黨意見的團結；今後黨也要從這方面貫徹黨內民主生活，羣策羣力，保證黨的活力與強大。

(二) 在政治路線方面。義共將召開中央委員會會議，澈底分析選舉結果，討論對義共具有歷史意義的若干成就，同時要從各黨的失誤以及政府施政挫敗等等的檢討之中取得政治教訓，俾供往後調整自己政治設計的參考。義共仍將繼續執行貝林格的政策，廣續義共歷屆大會，特別是十六大所釐訂的策略、路線與黨綱。同時義共要維護其形象以及它在全國的角色，發展國際戰略，保持

註② "Party Leaders Hold Coalition Talks With Craxi" in *Daily Report: Western Europe*, No. 143, (July 25, 1983) pp. L1-L2. "Coalition Talks on Schedule, Craxi Optimistic" in *Daily Report: Western Europe*, No. 146 (July 28, 1983) p. L1.

註③ "Berlingues Report to PCI Central Committee" in *Daily Report: Western Europe*, No. 41, (Feb. 29, 1984) pp. L1-L6.

註④ "Opposition Set to Defeat Government Coalition" in *Daily Report: Western Europe*, No. 69, (Apr. 9, 1984) pp. L1-L2. "PSI Spokesman See PCI Return to Extremism" in *Daily Report: Western Europe* No. 43, (Mar. 2, 1984) p. L2.

註⑤ 請參閱陳璋津，貝林格逝世與義大利共產黨的新動向，〈問題與研究〉第廿四卷第三期，民國七十三年十二月出版，頁六九～七一。

政治自主。在核子時代中，義共要強調和平的重要性，建立國際和平共存、低盪、監督裁軍的現實與和平、社會主義、人民解放之間的新關係，直到克服兩強對立爲止。義共要在國際與國內兩方面克服南北失調，促進世界新發展；宣揚歐洲對未來道路的抉擇何者爲優，俾供西歐工人運動和左派力量建立社會主義的參考；推動歐洲進行民主與社會主義變革的新方向，復甦與重建歐洲共同體。此外，以民主的手段來改造義大利社會，有其戰略選擇的價值，祇是這條路線需要格外努力，以克服義大利政治生活中對共黨的偏見與限制；與天主教改善關係，尤爲重要^{②4}。

納塔稍後在接受電視和電臺訪問時，更清楚地說明義共的政策。他說：義共的路線仍是「民主的輪替」，對內主張更換政府，實行公正廉能的政治。不過政府組織的公式，現在義共尚無構想，還希望聽取其他黨派的意見。對於基督教民主黨，義共要求除去一切帶有基督教民主黨意涵的公式、方法及其導向的統治符號；對社會主義黨，義共呼籲渠等能與義共合作，不要老是懷著政治偏見，排擠義共，甚至向義共的合法性挑戰。而義共的外交政策因貝林格去世，有了一個更好的環境，可以用來尋求一條阻止武器競賽和裁減核彈的道路。義共將改善與蘇聯的關係，不過義共仍維持其在國際間獨立自主的道路，不受外力干涉^{②5}。納塔上臺後在內政和外交上均有所突破。義共在六月底歐洲議會選舉獲得勝利，擁有三三·三%的選票，超過基督教民主黨〇·三%，開創新紀錄。同時義共也迫使社會黨和它對話，打破多年來政治封鎖的局面。此外義共與蘇共的關係也有顯著的改善，納塔將赴莫斯科訪問^{②6}。

一九八五年五月義大利舉行地方選舉，義共表示如果此次選舉中義共得票率超過其他政黨，義共應參加政府；克拉克西按照民主政治的原則，接受這個論點^{②7}。同時義共發動了關於工資指數的公民投票問題。義大利現行的工資指數制度是一九七五年工會與僱主雙方協商確定的，每季按指數調整工資一次，工人藉此可以補償因通貨膨脹而受到的損失。由於實行指數制度，再加上勞動法對僱主施加的種種限制，勞動成本的增長超過了通貨膨脹率的增長。克拉克西政府於一九八四年頒佈了放慢滑動工資上漲速度的決定，削減工資指數，使勞動者的工資受到一定的損失。對此，義共作出強烈的反應，並征集全國簽名，要求舉行公民投票。按義大利憲法規定，倘有五十萬人簽名，公民投票即可舉行。到一九八五年地方選舉之前的簽名人數已達一百五十萬，義共揚言除非國會通過替代方案，否則將於六月就政府削減工資指數的決定舉行複決投票，如果反對成功，克拉克西政府應下臺^{②8}。

註^{②4} "PCI's Natta accepts Secretary Generalship" in *Daily Report: Western Europe*, No. 130 (July 5, 1984) pp. L3-L8.

註^{②5} "PCI Secretary Natta Interviewed on Policy Line" in *Daily Report: Western Europe*, No. 125 (July 2, 1984) pp. L3-L4.

註^{②6} 參閱陳璋津，同前揭書，頁七七—八〇。

註^{②7} 吳文建，〈義共圖藉選舉之機攫取政權〉，《聯合報》，民國七十四年五月十三日第六版。

註^{②8} 張契尼，〈義大利政局面臨的問題〉，《人民日報》，一九八五年五月十日第七版。

義大利五黨聯合政府同心齊力地應付義共來勢汹汹的兩項挑戰，結果都安然過關。義共在此次地方選舉中獲得三〇・二％的選票，還損失了羅馬市長等重要城市的寶座，基督教民主黨獲得三四％的選票，略勝一籌。至於工資指數的公民投票，義共的反對案以四五・七％對五四・三％宣告失敗。

義共在內政問題上遭受挫敗之後，轉向國際共運進軍。中共與義共的雙邊關係自一九八〇年以來非常友好，號稱國際共運新模式的樣板；義共積極地想把這種新模式推展到義共與蘇共的關係上去。一九八六年一月納塔赴蘇與蘇共總書記戈巴契夫會談，開創出蘇共與義共關係的新里程。雙方表示，要在「完全尊重各黨獨立」的基礎上發展兩黨之間「友好和建設性的關係」。戈巴契夫說：蘇共和義共對某些問題、事件和事實的評價存在著分歧是自然的事情。蘇共主張發展對話，並且採取符合今天的精神和要求的對話形式。納塔也表示：比較各黨的經驗，自由而坦率地交換意見，甚至在出現分歧和立場不一致時也相互尊重，是各黨之間建立友好合作關係的前提。今後，義共將本著這種精神處理義共和蘇共的關係。此外，義共與蘇共在國際問題的看法上頗為一致，雙方強調：必須盡一切努力來扭轉軍備競賽，防止宇宙軍事化，爭取在均衡和可核查的削減核武器以及常規武器方面取得具體成果；必須使歐洲軍事力量的均衡保持在比較低的水平上。雙方認為，政治解決地區性衝突對緩和國際緊張局勢具有重要意義^②。納塔與戈巴契夫的會談，解開了雙方從一九八一年以來的糾結，邁向國際共運的新紀元，值得重視。義共同時也擺平了黨內親蘇派的問題，將更為團結一致地發展獨立自主的道路。

一九八六年四月義共在佛羅倫斯（Florence）召開十七大。納塔在大會的報告中特別指出「現代性」的問題來。納塔認為「科技革命」是當前歐洲工人運動必須面對的大事，在一個科技革命所造成的現代社會之中，階級對立與矛盾雖然沒有消失，然而歐洲工人運動中社會「革命」或「改良」的爭論已經失去了意義，歐洲需要一個新的工人運動綱領。義共呼籲歐洲的社會主義者、進步的力量結成一個新的人民陣線，提供歐洲激進的左派各種具有創意的改革方案。納塔也表示希望蘇聯戈巴契夫的内政改革與外交轉變能夠成功，共同面對現代社會的問題。此外，納塔攻擊美國的雷根主義，要求義大利政府不要加入雷根的「星戰」計劃^③。納塔的報告也重申「民主的輪替」路線，並且提出「綱領政府」的構想。他指出：義大利國內嚴重的失業問題尚未紓解，國家債負達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南方與北方的差距仍在擴大；而當前義大利政府缺少解決上述問題的相應措施。目前的首要任務是製訂一項新的綱領，並建立一個新的國家領導機構。為此，義共提出建立綱領政府，從政治上進行改革^④。納塔的報告深受義共親蘇派領袖哥塔與工會領袖拉瑪的贊同。哥塔在大會強烈地攻擊美國與利比亞的軍事衝突，警告義大利當局不能把義

註^② 入義共總書記納塔訪蘇結束，〈人民日報〉一九八六年一月卅一日第七版。

註^③ "17th PCI Congress Open" in *Daily Report: Western Europe*, No. 69, (Apr. 10, 1986), pp. 11-12.

註^④ 入義共十七大開幕，〈人民日報〉，一九八六年四月十日第六版。

大利淪為美國海軍的兵營。哥殊塔也反對美國的星戰計劃，認為它將促進戰爭爆發^②。拉瑪則贊成納塔所提「為歐洲左派的創新與現代化努力」這個新方向^③。義共十七大可稱為相當團結的大會，也是一個具有前瞻性的大會。

義共十七大選納塔為總書記，並改革黨的結構。義共中央委員從一八六名擴充為二一六名，中央監察委員從五六名增加為六一名。全國代表大會也從每四年召開一次，改為每三年一次。義共十七大最引人注目目的是德國社會民主黨、英國工黨首次派代表團參加，顯示出義共與歐洲社會主義黨結成新陣線的意願。

義共從一九八〇年放棄「歷史性妥協」路線到一九八六年四月召開十七大期間，一再努力探索一條新的「民主的輪替」路線。而這條新路線並沒有給義共帶來新的轉機，獲取政權；却是在國際共運上發展出新的形態。一個多元化的國際共運已經形成，它是以各共黨獨立自主、相互尊重、求同存異的原則，共同努力促進和發展彼此間的關係。這種國際共運沒有所謂領導黨、領導中心，沒有所謂社會主義模式，也沒有一個國際共運的指揮總部。各共黨在雙邊的層次上，發表宣言，表達彼此的立場，尋求更多的共同點，以期相互學習對方的經驗。這一種新形態的國際共運是義共領袖陶里亞蒂在六十年代所提出，八十年代義共終於成功地達成他的心願。然而義共在內政上依舊面臨以下的困境與難題：

(一) 信心問題。六十年來義共歷經葛蘭西、陶里亞蒂、隆哥、貝林格不斷的努力，發展出獨立自主的道路。面對西歐自第一次世界大戰以來資本主義與民主政治的發展，義共從理論、黨綱、策略到活動形式，都有所開創，逐步掙脫了蘇聯的領導與模式。可是義共仍舊掛著「共產黨」的黨名，在這塊招牌的陰影下，義共難以獲得大多數人民的信任。他們深恐義共會像法西斯主義一般，在獲取政權之後，實行專政，破壞民主制度。同時義共也不可能更改黨名，因為這塊招牌還連繫著葛蘭西、陶里亞蒂、隆哥等人的英勇事跡與思想魅力，更改黨名會帶來更嚴重的認同危機。於是義共將一直背負著這個信心問題的重擔，蝸牛式地前進。

(二) 政治聯盟問題。義共從一九四七後一直居於孤立的反對派地位。雖然現今義大利有許多政黨願意與義共對話，解除對義共敵視的態度；可是提到支持義共執政，仍會有相當的考慮。義共現今在義大利政壇的力量，還不夠大到可以獨力組閣；即使義共可以自己組閣，它還要考慮到外力干涉的可能性。貝林格生前就說過，即使義共取得百分之五十一的選票，仍然不能夠上臺執政；智利的阿萊德政權是個活生生的例子。義共如何爭取到國內與國際間的聯盟與支持，似乎還是問題重重，前途茫茫。

註② "Reportage on PCI's 17th National Congress" in *Daily Report: Western Europe*, No. 72, (Apr. 15, 1986) pp. L2-L3.
註③ *Ibid.*